

文学需要批评。这种批评既推动文学创造、传播与接受，又影响文学思想和理论的发展。当代中国文学的成长与发展，离不开文学评论的支持、鼓励和影响。愿这一系列丛书，能够引导读者审美兴趣，促进当代中国文学风尚转变……

吴子林 著

批评档案

——文学症候的多重阐释

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青年学者文库 16

文学批评系列

批评档案

——文学症候的多重阐释

吴子林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批评档案：文学症候的多重阐释 / 吴子林著 .

—北京：中国言实出版社，2016.7

ISBN 978-7-5171-1946-3

I. ①批… II. ①吴… III. ①中国文学—当代文学—
文学研究—文集 IV. ①I206.7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65276 号

出 版 人：王昕朋

责任编辑：史会美

文字编辑：崔文婷

封面设计：王立霞

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地 址：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

邮 编：100101

编辑部：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甲 1 号

邮 编：100088

电 话：64924853（总编室） 64924716（发行部）

网 址：www.zgyscbs.cn

E-mail: zgyscbs@263.net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889 毫米 × 1194 毫米 1/32 6.75 印张

字 数 170 千字

定 价 34.00 元 ISBN 978-7-5171-1946-3

自序

这些年“驰骋”学界，总有不少朋友问我本科毕业于何所大学，此番情形与今日毕业生就业用人单位必先询问其出身颇为相似。我坦言告之“福建漳州师范学院”（现改名为“闽南师范大学”），朋友们往往诧异不已。因为我的母校并非重点大学，我的出身何其“卑微”也！于是，有人惊呼“奇迹”，有人深表“敬佩”。可是，这一切在我看来，根本就没有什么可惊可叹，因为自己是一步步走过来的，其中甘苦自知，自然之至。若说有什么“奇迹”，那就是大一开学不久发生的一次“刻骨铭心”之“神秘体验”。

我是1989年9月入学的，是母校中文系第二届本科生。起初我的愿望是做一名律师，内在的冲动自然是当时看了不少港台电视剧，看见那些律师在法庭上雄辩如滔滔江水，下面听众则掌声雷动，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，艳羡不已。于是，高考报志愿时就填报了“西南政法大学”的“法律学”专业。谁也没有想到，高考成绩一揭晓，自己都傻了，当年数学只得了八十几分（满分一百二），较之自己平时的水准降了二十余分。虽说总分上了本二线，但心里便已明白“西南政法大学”是上不成了，只有等候“发落”的份，因为填报志愿时自己写了愿意接受调配。那段日子简直是煎熬，我

大哥其时已在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攻读硕士，暑期回来得知我的成绩，失望得不说一句话。这也难怪，我在县一中文科班里一直是名列前茅的，最高纪录是整个年级第四名，在班上一般是第二名。高考前后的落差也实在忒大了！我此次高考之败落，用我大哥的话说，犹如发生了一场“地震”！

世事难料，紧接着发生了第二场“地震”。我终于收到录取通知书了，拆开一看傻了眼：自己居然被“漳州师范学院”给录取了，而专业居然是“中文系”。这学校，这专业，对于当时的我确是闻所未闻的。年迈的老父亲过来询问了，我有气无力地告诉他，他误听成“漳州司法学院”，非常高兴地说：“好啊，这学校还可以。”我纠正了他的误解，老父亲也傻了眼，不过还是安慰了我：“没办法了，你就先去念吧。反正毕业了有份工作，也不错。”现在年轻一代肯定不知道 20 世纪 80 年代的情形。尽管被称为“太阳底下最光辉的事业”，当时教师的职业其实是最不受欢迎的：一者教师的社会地位不高，属被歧视之列；二者教师待遇极差，开白条拖欠教师工资是常有的事。以是之故，每年高考，填报师范类的考生都不多。为了完成招生指标，只好“抓壮丁”了，即凡是填写“愿意接受调配”的，一律收入囊中。我当时对此一无所知，无意中就成了“壮丁”之一了——真是阴差阳错！当大哥听到我被录取的消息时，往床上一躺，颓然地说：“你的高考不亚于一场地震啊！”过了一会儿，大哥直起了身，对我说：“算了，就这样吧，一切从零开始，进大学后认真学习，准备四年后考研究生！”大哥一直就是我崇拜的偶像，1982 年他以全县高考第二名的成绩考取了厦门大学，1987 年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——1965 年 9 月 17 日，该研究所首次人工合成胰岛素，轰动了世界——攻读硕士学位。因此，不瞒大家说，还没有进大学的校门，我就下定了“考研”的决心。

在酷暑中，我终于踏入漳州师范学院的校门了。在同班同学的记忆里，我又黑又瘦，穿了双薄得剩层皮的拖鞋，披了条浸透汗水的毛巾去报到。在我自己的记忆里，刚下接待新生的校车，就看到了当时逼仄的小校门，还有一栋与中学无异的教学楼，心里顿时就凉了：这就是大学呀？前几年自己到过厦门大学，就暗暗发誓以后上个比它更好的大学，可如今……唉！在慌乱中办完了入学手续，便是学前教育了。老实说，我仅知道自己的中学语文老师都是从师范类大学出来的，便顾名思义地以为“中文系”就是“培养中学语文教师”的专业。当辅导员告知“中国汉语言文学”简称“中文”时，自己终于豁然开朗了，于是开始痛恨自己的“无知”，觉得应以如饥似渴的端正态度好好学习。

学前教育后，紧接着是一个月的军训。在焦虑和等待中，终于开始上课了。一个个老师轮番上了讲台，说实话，除了林继中教授（我国恢复学位制度之后的第一批十八位博士之一，山东大学唐诗研究“泰斗”级专家萧涤非先生的关门弟子，我国著名的杜诗研究专家）和西方文论专家刘庆璋教授的课程外，一些课程现在想来基本已没有什么印象了。非要说有的话，那只有四个字，即“照本宣科”（后来，自己也当过大学教师，知道这是教学与科研未能统一起来的结果）。那教学“效果”真是可想而知：同学们坐得东倒西歪，或窃窃私语，或铺了象棋“厮杀”，或趴课桌入睡，乃至“黄河泛滥”……那时，最让人期待的似乎就是下课后冲到食堂！以是之故，我们私底下称自己学校为“吃饭”学院。有时，有的同学干脆连上课也不去了，就在宿舍酣睡，上午睡到九点，下午睡到三点。这样，学校又有了个雅称——“九三学社”。在这种氛围下，自己真是困窘不已：四年后得考研呢，怎么办？是“随波逐流”，还是“我行我素”，闯条出路？可是，路又在何方呢？……显然，想从“照本宣科”的老师那里得到帮助是不可能的。

这时，我想起了“图书馆”。那是由若干塑钢搭起来的一个简易房，分为开架书库和闭架书库两部分，当时藏书量约为三十万。记得林继中教授给我们上课时说过，你们不要嫌它小，大学四年里能读个 5% 或 10%，就不得了啦。怀着这份念想，我终于步入了图书馆。

起初，我基本是借一本随即还一本，一个礼拜往返“图书馆”两三次，因为大一的我实在是看不懂。如，王元化先生的名著《文心雕龙创作论》，自己才翻了两三页就看不下去了——回想起来，当时的知识储备太少了，现在看起来津津有味。看不懂就还，还了再借。“图书馆”的管理人员也渐渐跟我熟了，不时也会热心推荐些畅销书。就在这来来回回中，我借到了马莹伯先生的《别、车、杜文艺思想论稿》（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6 年版）。别林斯基、车尔尼雪夫斯基、杜勃罗留波夫，是俄国 19 世纪著名的文学批评家、美学家，他们的文学评论与美学思想在俄国文学史上起过巨大的作用，推动了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进一步发展。马莹伯先生在论及每一批评家时，首先都扼要地介绍他们的生平和思想，然后抓住其文学理论和批评方面的若干要害问题展开论述，使读者对他们在文论与批评领域的成就、贡献和特色，能获得较为明晰的认识。其中，谈到别林斯基敏锐地发掘了普希金、克雷洛夫、格里鲍耶多夫、果戈理、赫尔岑、冈察洛夫、屠格涅夫、涅克拉索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一批作家，并对他们的作品予以热情的评论，及时地总结其经验和成就，对俄国文学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指导性作用。当读到这里时，我感觉眼前一亮，原来文学的事业可以如此辉煌呀！一瞬间，沉寂已久的满腔血液沸腾起来了，仿佛一条未来的路在眼前次第铺开了。一代文豪歌德曾这样谈到自己读到莎士比亚作品时的感受：

当我读完他的第一个剧本时，我好像一个生来盲目的人，

由于神手一指而突然就是天光。我认识到，我极其强烈地感到我的生存得到了无限度的扩展。

我读到马莹伯先生的《别、车、杜文艺思想论稿》时，所产生的也是同样的体验。于是，便如饥似渴地“啃”读起来，一边读一边做读书卡片。这本书读完了，我就到“图书馆”找来了别、车、杜的著作，书读完了，也就明白了作为一名中文系的学生，日后可以做什么了，自己应该做些什么了。

当时，自己真的“掐指一算”，知道我是属于21世纪的，我的理想是成为“21世纪中国的文学理论家、批评家”，做“中国的别林斯基”。这就是我当时的“远大目标”。我不敢说，自己一定能实现这个理想，但可以说现在正朝着这个理想靠近。只要不断地靠近目标，应该说就是成功了。因为理想完全实现了就不是理想了，而是现实。理想的实现不是简单的事，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的必然结果。现在自己早已过不惑之年，如果说有什么聊以自慰，首先应归功于马莹伯先生著作的“启蒙”。这次“启蒙”彻底改变了我，让我感到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在牵引自己，让我感觉到自己所从属的“世界”，我的生活由此充实起来、丰盈起来……

于是，在大学四年里，我成了班上为数不多的“另类”：一心埋头“啃”那些一般人不愿读、不想读的理论著作——哲学、心理学、社会学、美学和中西文论，疯狂地做读书笔记（1993年毕业时统计了一下，四年里借阅了百来本理论著作，做了三四十万字的读书卡片、笔记）；为了一个学术观点，可以在课堂上与老师争得面红耳赤；当别人为当上班干部、学生会干部，为每年度的优秀奖学金“鏖战”时，自己奉行“六十分万岁，六十一分浪费”的信条，淡然处之。现在回想起来，自己就是那童话里的“丑小鸭”，特立独行的“丑小鸭”。不仅自己没有想到，许多老师和同学也没有想

到，若干年后，这只“丑小鸭”竟“飞”到了北京。2002年，北师大博士毕业，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，在文艺学研究的领域耕耘着，奋斗着，为了当初年少轻狂的“远大目标”。这么说完全没有自我陶醉的意思，我想表明的是：每个人的一生都是充满了未知的可能，在人生的旅程中，一件小事，一本书，一个人，都有可能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；而二十多年前的个人阅读史中，与别林斯基的“神秘”相遇就彻底改变了我。大学毕业离校前，图书馆的周敏瑾老师对我说：“子林啊，以后你成了文学博士，可别忘了母校的图书馆，是它滋养了你！”我记得当时自己使劲地点了点头！

20世纪德国思想家史怀泽说过：“人应尽可能地发展自己的所有能力，并应用尽可能广泛的物质和精神自由，为真诚地对待自己，同情及帮助周围所有的生命而努力。人应严肃地对待自己，应始终牢记自己所负的一切责任。”

为此，我们应当经常倾听一下自己的生命在说什么，它真正的需要是什么，怎样的状态才是它感到最舒服的状态。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的人生有严肃的责任心，对自己该做什么、不该做什么有严肃的考虑。这是对自己的生命负责，对自己的人生负责，是对自己生命的最大尊重。

收入本书的十五篇文章是我行走在文学批评之路上的一个纪录，故名之曰“批评档案”。

是为序。



自序 //1

诗人：人间的“安泰”

——杨骚诗论蠡测 //1

对话：金圣叹评点与英美新批评 //12

“症候阅读”

——金圣叹“独恶宋江”与“腰斩”《水浒》新论 //26

女性主义视野中的“身体写作” //54

“文学终结论”刍议 //66

对于“文学性扩张”的质疑

——兼论文艺学的边界问题 //80

图像时代文学的命运

——以影视与文学的关系为个案 //92

玄幻小说的文化面相 //108

文艺学研究的一种可能向度

——以文学批评家胡河清为例 //130

“唯一有价值的就是拥有活力的灵魂”

——讲述“中国故事”的方法或主义 //158

“菲洛克忒忒斯的神弓”

——当代文学批评的歧途与未来 //177

跋 //203

诗人：人间的“安泰”

——杨骚诗论蠡测

诗论，是诗人创作路途中停息驻足之所。它是一种事后的反省，更是一种自我的表白。杨骚，是一个有名的诗人。当他将目光沉静莹澈地栖息在造化万物时，就开始了异乎直觉的理性思索，伴着挥洒汗水和纷至沓来的阵痛之后的惶惑……

一、“做人”与“作文”

有诗以来，人们对“诗人”作了许多精彩纷呈的解说。但至今似也无一人能将其一言道尽。因为人们往往将诗人视为超俗之神，而忘了他首先是活生生的人，然后才是“诗人”。

美国当代颇盛名的文学批评家诺曼·N. 霍兰德在《文学反应动力学》一书中有这么一段有趣的论述：

文学之独特而又奇妙的力量在于：它以一种强烈而又高度浓缩的形式，为我们完成了随着我们自己的成熟必须要做的事情——它把我们原始的、幼稚的幻想转化成成年的、文明的

意义。

这位精神分析大师似乎告诉我们：作为审美意识形态的文学，是不自由态的自由补偿或升华。倘若联系马克思关于人类自由个性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的论述，我们不难宏观地把握其真正的原义：文学显现了人类实现自己精神与审美的自由、发展和解放——即如何“做人”的漫长历程。

我们无法于杨骚遗著中，寻出“文学是人学”的论说，但我们从其言论、诗作中，却可以发现对此诗人有着最为清醒的认识。这不仅表现在他十分明确地说过：做人不一定要作文章，作文章却须先要做人；而且，从其文学生涯看，他从未曾放弃过这种思想。

真正的思想家和诗人从来就是庸俗现实的反抗者和超越者。杨骚年少时，似就满骨子里嫉恶如仇、桀骜不驯。这一秉性促成了其刚强的性格和正直的心胸。你听，淅淅沥沥的淫雨中，感受到“变形的暴威压迫”时诗人的心声——

哦！Piju，你今何在？

你说踏过碧绿的汪洋，

……

将向炼狱投下了你的形骸……

我且问你，Piju，哦！我且问你，

从血肉横陈的修罗场，

你看到了一些光焰来？

——《怀 Piju》

哀怨乎？悲愤乎？……诗人情愫是如此激烈，以至满眼尽是凄凉之景：

浮漾，浮漾，月儿浮漾！
漫漫地，漫漫地，弥漫，
暗淡，暗淡，弥漫，
白茫茫，白茫茫，白茫茫……

——《中夜雾》

“一切景语皆情语”（王国维《人间词话》），在沦于虚室的迷惘中，诗人的心在流血、在慨叹：

名誉么？真理？
啊！这个欺人自欺的军令旗！
艺术么？美人？
啊！这个陈旧腐烂的古神秘！

——《流浪儿》

诗人几度的漂泊、彷徨、厌倦了：“生叛逆了我，不是我叛逆了生。”终于，“在一个蒙着迷雾的清晨 / 我看中了一株桃树 / 将衣带解下，挂上桃枝！”一阵晕乱战栗中，“脑后的雄鸡大胆地高啼 / 衣带子吓断了，我坠地……”成了“自杀未遂犯”。对此，我们不必过于坐实。他们提供给我们的是一幅灵魂剧痛“图”——悲愤、茫然、绝望进而抗争！在它的背后，隐着的是对时代深重灾难的严峻关注，以及对祖国、人民的挚爱。诗人这种近乎颓唐的感伤，倘若我们联系到同时期的郁达夫（《沉沦》）和鲁迅（《彷徨》），便不难理解了。

在其他一些文章中，杨骚也描述自己的心灵历程。据诗人自述，1918年夏，自己是带着“想当个救国英雄”的宏愿东渡日本的。但身居异国却屡屡受挫：进海军学校无望，开矿救国计划又流产。

“我什么都失败了，失败！但我希望成功么？世间到处有这样的丑恶、卑鄙、无情，自己的心中又装满着这样的荒废，疲劳，我还希望什么成功么？”（《十日糊记》）这种忧郁是如此浓烈，以至1923年9月东京大地震，竟“使自己觉得自然的威力非常伟大可怕，人类非常渺小丑恶”（《自传》）。这里的“渺小”感，实际上正是失败之后回天无力的心态显现。但倔强的诗人血管里流动的，仍是热的：“人是生的，生须活动，活动要热。我活动罢，怀着自家的伤心苦情活动罢、热罢；非然，我将如何？……什么什么都好，只要有热，只要有热呵！”尽管，“在这儿看得见的只是一些好斗的野牛和狡劣的狐狸精，或是蠢贱的肥猪”，自己“虽不会探求，自己却无时不在探求，探求美在何处”。几番寻觅后，诗人作出了选择：“我还是向文艺战线这方向走罢。既不会太过白白送死，又较近自己的性质。”（《十日糊记》）

诗人严厉地自我解剖，不正证实了精神分析大师霍兰德所言非谬？没有了对美的执着之爱，没有了对精神的自由、发展和解放的不懈努力，也就无所谓“爱”与“恨”，更没有了求真、求善和求美的文学。简言之，“做人”是“作文”的必要前提。杨骚是深明其理的。因为它已由诗人走上文学之旅所证实。1927年秋末诗人回国。这次的阔别归乡，予诗人创作极大影响。就其“诗论”论，则是展开了毕生为之努力的工作。

二、建设新兴文艺

别林斯基说过：“在构成真正诗人的许多必要条件中，当代性应居其一。诗人比任何人都更应该是自己时代的产儿。”

如果说20世纪20年代（归国前）诗人创作表现出的是现实的、带浪漫气息的感伤主义倾向，那么，诗人20世纪30年代之作，

随着对时代社会更多的耳濡目染，而表现为沉郁的、感伤的现实主义了。

诚如诗人所言：“时代已经不是浪漫好玩的时代，人心当然要受着影响，我相信这不是我的衰老，而是我更进一步地知解人生和创造人生的开始。”（《昨夜》杨骚之部第 77 封信）因此，诗人在批评自己以前“那些呀呀哟哟，恋爱故事和痰迷或发小牢骚”之作的同时，还一针见血地指出：“在次殖民地的中国，一切都浴在急风狂雨里，许许多多的诗歌的材料，正赖我们去摄取，去表现。但是，中国的诗坛还是这么的沉寂：一般人在闹着洋化，一般人又还只是沉醉在风花雪月里。”（《缘起》）于如此氛围之下，诗人何为？早在 1930 年诗人便已明确：“我要在群众之中找点热气，取点暧昧”（《昨夜》杨骚之部第 63 封信）来“御寒”了。此刻，则更为清醒地认识到了所肩负的重责了：

我们不凭吊历史的残骸，
因为那已成为过去。
我们要捉住现实，
歌唱新世纪的意识。

.....

压迫，剥削，帝国主义的屠杀，
反帝，抗日，那一切民众的高涨情绪，
我们要歌唱这种矛盾和它的意义，
从这个矛盾中去创造伟大的世纪。

与那些“洋化”派和“风月”派判然有别，诗人选取一条当时几乎无人问津的路——

我们要用俗言俚语，
把这种矛盾写成民谣小调鼓词儿歌。
我们要使我们的诗歌成为大众歌词，
我们自己也成为大众中的一个。

在这个《新诗歌·发刊词》中，杨骚与同仁们表明了彼此相同的心愿：它成为诗人们此后的创作宗旨。在相当一段时间里，杨骚诸诗人进行了不懈的尝试，希望“借着普遍的歌、谣、时调诸类的形态，接受它们普及、通俗、朗读、讽诵的长处，引渡到未来的诗歌”（《我们的话》，载《新诗歌》第2卷第1期）。

何谓“未来的诗歌”？这得从诗人走上革命道路谈起。1932年杨骚再次回到漳州。穷困逼迫中，诗人自觉：“一无胆量做土匪抢钱，二无婢颜奴膝的本能做官，三无狡猾的本能做商人，当然是要穷的，再无祖宗遗下什么大财产，最后留给我们的一条路，便是实际革命去。”（《昨夜》杨骚之部第86封信）故当诗人将那最真诚、最犀利的目光，毅然投向生活的现实之中时，便敏锐地握住了那频频起伏的时代之脉搏：“是阶级斗争最尖锐化的生活，是‘新兴’阶级勃起、苦斗、肉搏，必然地要代替老衰阶级而获得支配权，使世界成为××社会的，正在过程中的一个伟大的革命生活。”文学，是生活的审美反映，它自然地须描述出这一伟大的过程，勾勒出其中生活的底蕴。这样，建设新兴阶级（无产阶级）的文艺，便提上了日程。1932年9月中国诗歌会在上海成立，它所倡导的诗歌大众化，无疑的，是建设新兴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至此，我们洞察了“未来的诗歌”的真义。诗歌大众化运动，如果置于所处的“沉寂”之境，毫无疑问，当是一场筚路蓝缕、呕心沥血、力挽狂澜式的“革命”。但关键的是：这种革命如何进行的？取得了哪些成就？我们不妨将聚光点移于杨骚之上。他是这场运动的发起人之一，在